

毛泽东如何对待诗词注解

□ 汪建新

老一辈革命家诗词赏析



“《诗》无达诂”，语出董仲舒《春秋繁露·精华》，本意是对《诗经》阐释不易统一。后世文论家将其演变成“诗无达诂”，指读者对诗作会有不同解析和感触。毛泽东诗词独领风骚，读者如云，但毕竟是古典风格，难免见仁见智。毛泽东熟读诗论，深谙此理，对于各种注解和评论，只要不涉及原则和史实问题，基本不予置评。发现自己诗作被误读曲解甚至错讹，毛泽东也并非全不在意，他通过作批注、改校样、写回信、答疑问等方式，对自己诗词的字词句篇作了不少自注自解。这些注解是毛泽东诗词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为准确解读、欣赏、研究毛泽东诗词提供了珍贵史料。

主张诗不宜解死

1975年7月的一天，芦荻给毛泽东读了李商隐的《锦瑟》，这首诗很难解，历来众说纷纭。芦荻请教毛泽东怎么看，毛泽东说：“不要做繁琐的钻牛角尖的研究，只要感觉文采优美，徜徉迷离，给你一种美的享受就行了。这首诗为什么流传得那么久，自有它迷人的魅力。1976年2月12日，毛泽东复信刘大杰时说：“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，暂时存疑可也。”毛泽东对待古典诗词的这一态度，显然受到“诗无达诂”的深刻影响，主张不要解死，可以存疑。

正因为如此，毛泽东对自己的诗作也不主张过多注释，给读者留下更多自由的想象和创造空间。1961年出版毛泽东诗词英文版时，郭沫若曾问毛泽东要不要出一本统一的解释本，毛泽东回答：“没有必要，唐诗三百首，流传多少代都没有统一的解释。我的诗词也让别人去理解吧。”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63年版《毛主席诗词》后，几个编辑写了一个注释本，毛泽东在书稿上批了几行字：“诗不宜注，古来注杜诗的很多，少有注得好的，不要注了。”1964年，周世钊打算撰写评论文章，

连写两封信向毛泽东请教对诗集中一些作品作何理解。毛泽东回复：“拙作解释，不尽相同，兄可以意为之。”1971年冬，长沙的许多单位请周世钊去作学习毛泽东诗词辅导报告。次年，他见到毛泽东时谈及此事，毛泽东说：“你可以己意为之。我认为对诗词的理解和解释，不必要求统一，事实上也不可能求得统一。……长沙有人请你去作我的诗词报告，你就积极地去。你愿意怎么讲，就怎么讲；你爱怎么说，就怎么说好了！”

我有说明的责任

1963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《毛主席诗词》时，毛泽东不仅亲自选定诗集篇目，而且逐一进行审定，给作品定题、标注创作时间、修改诗句。1973年，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把自己的全部诗作抄写一遍，他一一核对校正，然后让工作人员再抄一遍，又再次核对。如此这般，反复多次。1973年7月，毛泽东在接见杨振宁博士时，谈到对自己的诗“有些注解不对头”时说道：“百把年以后，对我们的这些诗都不懂了。”毛泽东的感慨，表露出一种复杂心理，一方面笃信“诗无达诂”之理，另一方面内心还是希望人们能够正确理解他极为珍视的诗词作品的。

1957年1月，《诗刊》发表毛泽东的18首诗词时，毛泽东在致臧克家等人的信中写道：“旧诗可以写一些，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，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，又不易学。”毛泽东不提倡年轻人学写古诗，同样也担心他们读不懂古诗。1958年12月21日，毛泽东在广州读到文物出版社的线装本《毛主席诗词十九首》，发现有些注释不正确，他在书中天头、地脚和标题下的空隙处，对《沁园春·长沙》《菩萨蛮·黄鹤楼》《清平乐·会昌》等作品，写下12条1000余字的批注，其中有言：“我的几句歪词，发表以后，注家蜂起，全是好心。一部分说对了，一部分说得不对，我有说明的责任。”毛泽东诗词传播到国外，但翻译是个难题，比如，误将“黄洋界上炮声隆”翻译成“黄色海洋的边上，响起了隆隆炮声”，令人啼笑皆非。1963年《毛主席诗词》出版后，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立即组织翻译出版英译本。1964年1月，毛泽东应英译

者的请求，就其中的一些词句，一一作了口头解释，共有32条，达1900多字。这是毛泽东解释自己诗词条目最多、最详尽的一次，足见他十分重视作品的对外传播。

对曲解着力纠正

1945年11月，《沁园春·雪》在重庆发表后，各种解说层出不穷。而国民党御用文人又是撰文，又是赋词，极尽歪曲之能事，污蔑其宣扬封建帝王思想。对此，毛泽东不屑一顾。1945年12月29日，他在致黄齐生的信中写道：“国民党骂人之作，鸦鸣蝉噪，可以喷饭。”1957年《诗刊》发表《沁园春·雪》，毛泽东解释说：“‘惜秦皇汉武，略输文采；唐宗宋祖，稍逊风骚。’是从一个侧面来批判封建主义制度的，只能这样写，否则就不是写词，而是写历史了。”1958年8月21日，毛泽东对周世钊说道：“《沁园春》一词，只批评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不大行，或略输文采，或稍逊风骚，但并没有说明谁是行；至于‘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’，也并没有说明今朝有谁行，指个人也好，指群众也好，指无产阶级更贴切。”1958年12月21日，毛泽东对该词批注：“雪，反封建主义，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。文采、风骚、大雕，只能如此，须知这是写诗啊！难道可以谩骂一些人们吗？别的解释是错的。末三句，是指无产阶级。”毛泽东的自注自解，为正确理解这首词提供了一把钥匙。

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是毛泽东的代表作之一，但人们对该词所写景事究竟是一次还是两次出现不同意见。1962年5月，《人民文学》发表毛泽东《词六首》，郭沫若写成《喜读毛主席〈词六首〉》一文。他为说明毛泽东诗词虽人人爱读，却未见得人人都懂，首首都懂，便以自己对该《娄山关》认识过程为例，在文中持“两次”之说，并将清样送毛泽东“加以删正”。毛泽东认为解释不合本意，将其删掉，又以郭沫若的口吻，改写了一段近600字的“一次”之说，最后坦言：“由此看来，我在广州座谈会上所说的一段话，竟是错了。解诗之难，由此可见。”不巧，《人民文学》刊出的仍是郭沫若的原稿。1964年1月27日，在

答复《毛主席诗词》英译者问时，毛泽东又再次重申了“一次”之说。毛泽东的《改文》直到1991年12月26日才在《人民日报》刊出。

为读者解疑释惑

1956年6月，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后，写了《水调歌头·游泳》。之后，他把词作寄给黄炎培，“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”。或许黄老不擅长游泳，对“极目楚天舒”颇为不解。1957年2月11日，毛泽东又致信黄炎培，说明道：“游长江二小时飘三十多里才达彼岸，可见水流之急。都是仰游侧游，故用‘极目楚天舒’为宜。”

1958年，毛泽东“谈六月三十日《人民日报》，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。浮想联翩，夜不能寐。微风拂煦，旭日临窗。遥望南天，欣然命笔”，写下《七律二首·送瘟神》。随即他致信胡乔木，要他同《人民日报》商量发表事宜，写道：“诗中坐地、巡天、红雨、三河之类，可能有些人看不懂，可以不要理他。过一会，或须作点解释。”作品发表后，他的老同学蒋竹如对“坐地”“巡天”的科学性提出质疑。1958年10月25日，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，专门对此作了解释：“坐地日行八万里，蒋竹如讲得不对，是有数据的。地球直径约一万二千五百公里，以圆周率三点一四一六乘之，得约四万公里，即八万华里。这是地球的自转（即一天时间）里程。……巡天，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（地球在内）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。银河一河也，河则无限，‘一千’言其多而已。我们人类只是‘巡’在一条河中，‘看’则可以无数。”蒋竹如得知后，为毛泽东非凡的诗词想象艺术深深折服。

1959年7月1日，毛泽东写了《七律·登庐山》。9月下旬，庐山疗养院护士钟学坤写信问候毛泽东，同时请教诗中“九派”和“三吴”的含义。12月29日，毛泽东复信，写道：“九派，湘、鄂、赣三省的九条大河。究竟哪九条，其说不一，不必深究。三吴，古称苏州为东吴，常州为中吴，湖州为西吴。”对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来信询问的问题，毛泽东郑重其事地予以答复，充分说明毛泽东对作品解释的严谨和对读者的尊重。



“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”

——走进北京宋庆龄先生故居

□ 郭子一

不觉秋深已近冬，草径清幽树林风，深秋的北京天高云淡，避开摩肩接踵的南锣鼓巷，漫步人烟稀少的胡同中，在什刹海后海北沿46号，我走进宋庆龄先生的故居。

故居正门处于南垣东端，门楼高大，灰筒瓦歇山顶造型饰以油漆彩画，悬挂着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”的黑底金字匾额。这里曾是清朝醇亲王府的西花园，新中国成立后，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筹划，葺旧更新。1963年4月，宋庆龄迁居于此，一直工作、学习和生活到1981年5月29日溘然长逝，在这里度过了生命最后的18个春秋。

由正门进入故居左转向西，途经油漆彩画的抄手游廊，再向北路过一片开阔的草坪园，抵至尽头就是宋庆龄在这里的住所兼办公室——主楼。这是一座“中西合璧”的二层小楼，一层左侧是一间小型客厅，这里的陈设保持着宋庆龄生前的原状，东墙正中挂着她亲自选定的孙中山画像。

1911年，辛亥革命爆发，宋庆龄正在美国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习，她充满激情地写下《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》一文，为“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”而欢欣鼓舞。从此，宋庆龄怀着对孙中山的尊敬之心，走到他的身边，协助他革命。她

跟随孙中山千里奔走，南征北战，讨袁反段，护国护法，坚定地支持孙中山先生进行反对帝国主义、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。她把一生与这位民主革命的先驱紧紧联系在一起，并将自己对革命事业的理解，熔铸其中。

手扶红色油木楼梯扶手，脚步踏在木质台阶上吱吱作响，来到二楼宋庆龄的卧室和书房。书房的办公桌上放着她日用的书籍、文件、钢笔和一副老花镜。与书房相连的卧室两边的床头柜上，一边摆放着1927年她访问苏联时与孙中山顾问鲍罗廷夫人的合影，另一边玻璃板下，则压放着孙中山的亲笔手书“共进大同”。

1925年孙中山逝后，宋庆龄继承丈夫遗志，那时，年仅32岁的她决然声明与国民党决裂，表示“在国民党的政策完全符合已故孙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则之前，我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该党的任何工作”。兄弟姐妹与她分道扬镳，她为实现孙中山生前遗愿殚精竭虑。她将对丈夫的一腔真情和挚爱，倾注到中国独立、自由、富强、民主的革命事业中。

出了主楼西行，沿着蜿蜒小路，能看到一座状如五瓣梅花的亭子，这是为纪念宋庆龄诞辰100周年修建的“瑰宝亭”，取周恩来赞颂她为“国之瑰宝”之意。亭子上的石雕、木雕都是梅花图

案，以寓宋庆龄高洁的品格。

1936年的中国，民族危亡旦夕，宋庆龄认为“国难当头，应该尽弃前嫌。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，抵抗日本，争取最后胜利”。她直接牵线，主动托人寄送意向合作的密信和慰问红军的药品到陕北交于毛泽东。宋庆龄旗帜鲜明地阐释和宣传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，为促成国共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。抗战期间，她还发起成立“保卫中国同盟”，在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中呼吁抗战、发起募捐，为八路军、新四军提供了大量医药和物资援助，并通过创办刊物将共产党的抗战业绩宣传至世界。

“瑰宝亭”北边的故居文物库是宋庆龄的生平展厅，展厅通过300多件历史文物，展示了宋庆龄波澜壮阔的一生。1952年在周恩来的支持下，宋庆龄创办了英文杂志《中国建设》，后改名为《今日中国》，至今引用中、英、法、德等多种文字，在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，成为世界了解新中国的重要窗口。

展厅里还陈列着很多她为全国少年儿童写的信、与孩子们一起的照片、儿童杂志等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宋庆龄一直关注着妇女、儿童教育和福利事业的发展，她领导中国福利会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儿童艺术剧院、第一座少年宫，亲自

为新中国第一本儿童刊物《儿童时代》题写刊名，经常为其撰写文章，被中国少年儿童称作慈爱的“宋奶奶”。2011年，“时代小先生”计划启动，以故居为基地，延续宋庆龄与“小先生运动”的故事，为少年儿童搭建服务平台、设计社会角色，使孩子们学习担当社会责任。每到节日或纪念日，很多孩子都来到这里，参加故居组织的诗词朗诵、文艺表演，这已经成为故居的一道亮丽风景线。

参观完毕，回望门口宋庆龄的汉白玉雕像，在一丛翠竹的衬托下恬淡安详，饱含期盼。1925年，她在致孙中山先生的挽联中写道：“先生先行，因求大舍小我；后人后继，誓变曲径为通途。”她为祖国和平繁荣、富强昌盛倾注无尽心血。国际记者伊斯雷尔·爱泼斯坦所称她是“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”。斯人已逝，幽思长存，逝者已矣，生者如斯。宋庆龄先生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必将薪火相传，生生不息。



悠悠运河，巍巍高山。
北辛遗迹，文明流传。
微山湖畔，滕国曰善。
抱犊岗鼎，云海如瀚。
榴园盛景，万众悉叹。
台庄一役，华夏皆叹。
中兴传奇，铁道忠胆。
枣庄复兴，崛起正酣。

枣庄，位于山东省南部，东依沂蒙山，西临微山湖，南枕大运河，北接孔孟之乡，既有北方城市的豪放，又兼具江南水乡的秀美，被誉为“鲁南明珠”。枣庄在唐宋时已形成村落，因枣树多而得名。勤劳朴实的枣庄人民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，用汗水描绘了一幅幅艰苦奋斗、自立自强的传奇画卷，用勇气谱写了一篇篇荡气回肠、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，用智慧擘画了一章章破而后立、蝶变升华的壮丽蓝图。

（一）

海陆变迁孕育出广袤而富饶的土地，在烟波浩渺中寻觅神秘的始祖印记。早在四五十万年前，远古人类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，75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，枣庄的先民们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“北辛文化”。北辛遗址的发现和北辛文化的确立，将山东史前文明发展序列的年代整整提前了1000多年，为追溯海岱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产生和农业的起源，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古老的京杭大运河诉说着历史的沧桑，悠久的运河文化在这里萌芽与滋长。经济因河而兴，文化依河而育，名人枕河而居。京杭大运河沿线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区域，滋养了枣庄地区深厚的人文底蕴。明清时期，运河的发展使台儿庄一跃成为沿运的商贸中心，南来北往的晋商、徽商、浙商等云集于此，清代《峄县志》记载，“台（儿）庄跨漕渠，当南北孔道，商旅所萃，居民饶给，村镇之大，甲于一邑”，乾隆皇帝赐为“天下第一庄”。重建后的台儿庄古城，再现了当时“商贾遍邇，一河渔火，歌声十里，夜不罢市”的繁盛景象。

美丽的中兴煤矿国家矿山公园在夕阳的映衬下熠熠生辉，仿佛在讲述着枣庄工业的荣耀与辉煌。1878年，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家民族股份制企业——中兴煤矿公司，在近代民族工业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。

在悠悠历史长河中，枣庄贤能辈出，豪俊迭兴，无数圣贤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历史的足迹，人类造车鼻祖奚仲，工匠祖师鲁班，主张“兼爱、非攻”的科圣墨子，“好客养士”的孟尝君，足智多谋、能言善辩、勇于自荐的毛遂，西汉名相匡衡“凿壁偷光”的典故至今脍炙人口。

（二）

“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，微山湖上静悄悄。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，唱起那动人的歌谣”。一首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传唱大江南北。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，热血的枣庄儿女结合工矿铁路环境，组建了闻名遐迩的铁道游击队，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浴血奋战，奏响了民族救亡的最强音，书写了“铁道飞虎”的抗战传奇。抗战结束后，困守在临城沙沟车站的千余名日军正规部队正式向铁道游击队投降。今天，当我们走进铁道游击队党性教育基地，耳边仿佛仍然能够听到当年蒸汽火车的阵阵轰鸣。铁道游击队“赤诚报国、不怕牺牲、机智灵活、勇于亮剑”的精神正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，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。

一寸山河一寸血，一杯黄土一杯魂。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前用花岗岩铺设的38级台阶在默默诉说着80多年前的那段烽火岁月。1938年3月，日军以南京和济南为基地，围绕贯穿枣庄的津浦铁路（天津至南京浦口），兵分三路从南北两段夹击徐州，台儿庄是必经之路。为了粉碎日军的疯狂进攻，中国军队在台儿庄一带展开了寸土必争的拼杀，于1938年4月以伤亡5万人的代价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，史称“台儿庄大捷”。这次大战是日军侵华战争中的首次败退，打破了“日军不可战胜”的神话，用事实证明“亡国论”的失败，改变了国际上对抗日战争的悲观看法。周恩来评价，“这次战役，虽



□ 陈平

昨天的枣庄，今天的枣庄

然在一个地方，但它的意义却在影响战斗全局、影响全国、影响敌人、影响世界”。

作为鲁南72岗之首的抱犊岗，不仅孕育了万顷红叶，也是红色革命的摇篮。1939年9月，八路军第115师在代师长陈光、政委罗荣桓的带领下挺进山东，抵达抱犊岗山区，建立了由共产党单独领导的抗日根据地。在那段抗战的艰难岁月里，115师主力以抱犊岗抗日根据地为核心，立足鲁南，驰骋沂蒙，开辟滨海，支援苏北，成为华北连接华中根据地的枢纽，是插在日本侵略者脊梁上的一把钢刀，被誉为“山东小延安”。

（三）

枣庄因工业而立，因工业而兴，未来也必将因工业而强。计划经济时期，枣庄依靠丰富的煤炭资源，累计对外输送原煤4亿吨、电力2000多亿度，为支持国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，由此确立了工业城市、能源基地的地位，也铸就了枣庄人的“工业强市”情结。

新时代新征程，市委、市政府作出“工业强市、产业兴市”的决策部署，加快构建以高端装备、高端化工、新材料、新能源、新医药、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体的“6+3”现代产业体系，以工业大发展推动经济大提速，以产业大提升实现枣庄大跨越。

在转型发展的进程中，枣庄因势而谋、应势而动，抢抓“双碳”政策机遇，把产业转型的目光聚焦到锂电产业，明确提出建设绿色安全新能源典范城市、打造中国北方锂电之都的奋斗目标，坚持全链条覆盖，全区域布局，全周期服务，全力建设山东首位、全国领先的锂电产业集聚区。

“山和山不相遇，人和人要相逢”。在枣庄市山亭区，有一段由葡萄藤条串起来的中德友谊。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出访德国期间发表演讲时讲道，“还有一位德国友人叫诺博，是德国葡萄专家，2000年至2009年间他同助手汉斯17次来到中国山东枣庄，向当地农民传授葡萄栽培、嫁接改良技术，将传承几百年的家族商标无偿授予当地酒厂使用”。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，我们精心建设了汉诺庄园，着力打造中德友谊基地，讲好新时代“汉诺故事”。

“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”。绿色转型中的枣庄，正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始终坚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，砥砺前行、逐梦前行，重塑老工业基地的昔日荣耀，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灿烂华章。

（作者系山东省枣庄市委书记）

